

马克思人类学思想新探

赵 凯 荣

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的研究,是当今世界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热点。但这一研究迄今为止尚有以下几点欠缺:①只承认马克思在晚年才具有人类学思想,对其理论渊源不甚了了;②很大程度上混淆了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同传统人类学思想的质的差异;③对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重大作用理解欠全面。本文拟就以上几个方面做些初步的探讨。

一 马克思人类学的理论渊源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的有机部分,即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之对应的有三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那么,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是什么呢?为了更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钢”,必须要弄清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说马克思只是在晚年才接近人类学思想是不正确的。

首先,马克思很早就开始接触人类学。早在柏林大学时,作为取得法学学位课程的一部分,他专修了H·史蒂梵斯的“人类学”。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凯利认为的那样,马克思早期著文都间接或直接地与此相关。当时在柏林大学,神学、医学和哲学等学科都教授人类学,只是侧重不同。医学人类学主要专注于对人的动物性方面做决定论的研究;神学人类学着力于对具有自由意志属性和接受神典潜能的灵魂做决定论的探讨;法哲学人类学则主要研究:如果人既是自然法则的主体,又具有道德选择的能力,那么二者的关系如何?在这二者(自然律、道德律)作用下,人和社会是怎样的?(这一点引导马克思发现了二种生产理论和人类原始社会赖以维系的经济因素和自然选择律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所选的“人类学”虽由一位神学家讲授(1836—1838)。但它却是作为审判和立法艺术的一种逻辑导论开设的,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要掌握一种关于社会和社会控制的理论,先必须理解人类的本性。在对一种系统的社会科学(唯物史观)探求的整整一生中,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前提。这些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已经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一部分出现了(人的存在、人的需求、人的生产等)。

其次,马克思很早就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早在柏林大学时,马克思在其法哲学研究中已经涉及了人类学的内容。当时在柏林大学,法哲学领域有两大思潮。一是萨维尼的“现实主义”,一是甘斯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是法的历史学派的主要理论,这一理论反对抽象法推崇自然的人定法。而理想主义则以黑格尔主义为原则推崇法是绝对精神的体现的思想。马克思曾深深陷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自然律和先验道德律的冲突中,但很快就摆脱出来。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明确申明了自己的“人类学”立场。在此文中,

马克思批判了法的历史学派的奠基人古斯塔夫·胡果自称为“法律家的人类学”导言的《作为一种实证主义哲学的自然法》。这是胡果多卷民法条款的第二卷。胡果的结论是：“人在法律上只是个动物”、“人的唯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①。他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分析，即自然界是一个由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人的“存在的巨链”。简言之，等级制是自然而生的。他根据康德、康多莱克特及民法提出一条自然法则，认为人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即使是十分自由的程度，仍然不能逃脱其自然本性，并认为这一原则具有普适性。当时马克思就认识到，胡果这位“法律人类学家”完全曲解了人类所有的社会制度和设施的价值，否认了人的自由本质，损害了人的尊严和形象。他叹道：“请看，我们这些青年德意志派接受的是哪家的观点”，“更糟糕的是，宪法被说成了纯粹的权力和‘动物法’。”^②在进行这一批判时，马克思是倾向于甘斯的“理想主义”的。一般而言，从人的角度去探索人的自由和解放大致可有三种途径：一种是自然主义，如胡果之研究，其结果是将人归为生物链。一种是突出人的思维创造性因素，是为理性主义，从意识上将人和动物区分（如甘斯）。此外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含社会历史分析）。这已是后来的事，但足以证明，马克思同人类学的关系很早就存在了。

此外，统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也不难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很大程度上吸取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从早期对胡果的自然主义人类学的批判，到后来对甘斯“理想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主义”的批判，再到1844年末1845年初摒弃先验人性论思想创立唯物史观，无不渗透着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印痕。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人性论“天性”“兽性”二分的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四个历史前提和两种生产的理论雏形及后来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这一线索非常鲜明。而且，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前，马克思就已研究了格奥尔格·毛勒对中世纪村社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更早，在研究罗马法时马克思已经领悟到，罗马的“公地”标志着“贵族”和“平民”区别的事实表明，在宗教事务以前，在罗马国王以及所有古代立法者之前，所有权就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而就是在唯物史观的重大原则（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创立方面，也大大得益于人类学提供的实证材料。

最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阅读了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菲尔等人类学家的著作后形成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标明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

这样，我们就发现，说马克思只是晚年才具有人类学思想是片面的，马克思人类学思想有其历史渊源，而且同其它三大来源稍有不同，这一渊源有极强的历史性，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的整个一生中。

当然，学术界之所以只承认马克思晚年方具有人类学思想而忽视其历史渊源，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是人类学在历史上的兴起，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在马克思出生时，这一学科尚属一般哲学领域，而在马克思去世时，人类学方从一般哲学中分离而告独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原始共产主义”和“私有制起源”的论争广泛展开，这期间恰是近代人类学的形成时期。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态度。当时的人类学主要是以研究原始社会和人种素质为传统的，这与当时的“进化论”热潮息息相关。恩格斯在1873——1876年的《自然辩证法》中谈到：“最近则有所谓人类学（这个名称很拙劣），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详细地研究和阐明。”^③这种主要是指向原始社会的人种或种族的人类学及生物人类学可称为传统的人类学，这种主要是自然主义的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宏大的社会历史理论相比当然是“拙劣”的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

二 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与传统人类学的差异及与当代人类学的焦点

这一问题与上一问题紧密相关，由于对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不甚了了，也就不清楚马克思是怎么通过批判传统人类学而形成自己的人类学思想的，从而将马克思的人类学同传统人类学等同起来。由于对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不清楚（从何处来），因而对这一思想的未来及其影响也就失去了赖以评判、预测的基础。

具体说来，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人类学。

1.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定然会反对将其学说同人类学相提并论。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人类学的态度上就可明察。恩格斯在1879——1883年间曾反复强调，这些关于人的“理论造成的害处要比他们的研究带来的益处多”。恩格斯主要批判了麦克伦南和梅恩的文献主义和拉萨尔、巴霍夫的唯心史观。马克思则更为具体。他主要批判了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唯心史观。1)他认为梅恩把家庭、特别是罗马氏族与领地而不是与血缘联系起来是曲解了原始社群的本质。2)反对将社会形态典型化和单一化，批判了梅恩将罗马纯粹土地制形式当作“英国的所有制形式”的错误。3)反对梅恩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家庭套用到远古社会，他引用摩尔根的话讲，这“离古代还远着呢！”4)批判了梅恩夸大道德舆论影响的谬误。他认为，同所有制问题相比，道德只是第二位的。5)批判了梅恩用父权原则（现代）说明男性继承权问题，指出了摩尔根和巴霍夫关于母权论思想在这方面的正确性。

2. 马克思人类学思想与传统人类学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第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马克思人类学是服务于唯物史观并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实证材料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传统人类学则以自然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唯心史观为指导。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眼里，一个是“唯一的科学”，一个是“拙劣”的“过渡”。第二、理论范围不同。传统人类学只将视野局限在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上，并将对人的研究局限在对人的种族的生物学和形态学的研究上，而且主要采取了决定论的因果方法。马克思人类学则不同，它对于原始社会的研究只是其社会形态理论的一部分，是为了更清楚地把握社会运行的历史规律，因而只是“过渡到历史的桥梁”。此外，马克思人类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综合理论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革命，除开唯物史观外，就是完成了继亚里士多德“包括了后来一切科学理论萌芽”^④的庞大理论体系后更高的关于人的社会综合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运动是一种最高形态的运动，而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则是较低层次的运动形式。传统人类学的关于人种和种族的研究至多只是生物学层次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理论从本质上是反对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决定论的。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有其前提，但其成为整体是由于这些因素都属于社会，或者把缺少的东西由社会造出来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整体”。^⑤第三、传统人类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因素，代表了殖民主义者对落后国家、地区、民族的剥削、压迫及文化侵略的倾向。传统人类学家大多为西方旅行者、探险者、殖民者和传教士。主要是以“原始人”、“野蛮人”、“未开化民族”、“部落民族”为研究对象。以进化论为背景，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也有类似的历史。于是，西方高于东方、白种人代表人种的最高阶段、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其它文明由此而传递（著名的传播论）就成了传统人类学的主要话题。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思想格格不入，在马克思在世就受到斥责。

综上所述，马克思人类学思想不仅同传统人类学思想有本质的差异，而且严格说来从本质上是反对这一人类学的。

但是，能否根本上否定这一人类学呢？显然不能。且不说这一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和发展的意义，在当代，由于世界形势的发展，人类学这一学科同昔日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了某些共同的关注点。查阅了《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日本中文大辞典》、《苏联大百科全书》关于人类学（anthropology）的辞条后发现，当代人类学与传统人类学有了一些明显的差异，表现在：第一、当代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而且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了理论探讨。第二、已经不再是关于人种和种族的研究，而是“关于人类研究最全面的学科群”，“其研究课题的兴趣包括如语言、社会结构、审美的表达和信仰体系这样一些完全不同的领域”。^⑥即成为关于人的综合研究，它特别突出了文化研究的意义。第三已经不再囿于自然的、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而更重于社会的分析和综合。人科学及人类学国际联合会主席希尔绍认为当代人类学“具体说来，就是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论都是，要把人这一现象置于全面的环境中来考察。要涉及自然的、生物的、以及尤其是社会的世界的一切方面和种种变项。”^⑦

以上三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同当代人类学的焦点。特别是，当代人类学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人类学的设想。马克思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就预言：“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以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⑧马克思甚至在批判胡果的“法律人类学”时就表现了两种意向性：一是将法哲学看作兼具知识、理论、实践的整体系统，一是专注于“百科全书”的研究。二者皆融于后来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中，标志着一种新的、超越生物学的社会综合。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类学，由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缺陷以及在现实中的某些有害倾向，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格格不入的。传统人类学囿于人性的“互补性”而未能摆脱精神和肉体的对立二元论（把人的精神本质绝对化的唯心主义方法，赋予人的自然生物性以首要意义的自然主义方法），形成了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因而，传统人类学不管是以自然主义还是人本主义（或社会生物论）为其方法论基础，都是还原论的。现代人类学是以现代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这里也可以看到传统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方法论差异：即还原、孤立考察的方法同反还原、整体考察的方法的对立。传统人类学，不管是戈比诺的“人种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学或生态学的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的变种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分析理论）都是片面夸大自然生物性的结果。从其主要代表德国哲学家尼采和舍勒的著述中不难看到这一点。现代人类学则试图克服这一缺陷。哲学文化人类学的主要代表罗塔克和兰德曼依据普勒斯纳的著作试图在整体上把人的自然生物存在同精神活动统一起来，把人理解为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创造物。但是，现代人类学在克服片面生物论的时候，走向另一极端（反还原）。例如兰德曼一般地否定生物进化因素对于认识人的本质的重要意义。因而这种整体考察从本质上讲也是片面的。它推崇综合研究却排斥局部性的、还原论的考察。甚至就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的学者也不例外。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不过是将弗洛伊德理论中本能因素代之以心理因素的变种；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人学的“修正”，不过是要加入对人的“生物学测量”的内容，是要进行“人类学革命”。尽管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坚决反对将自己列入某一资产阶级人类学流派，但其并未摆脱现代人本主义倾向。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管是把科学和客观知识绝对化（唯科学主义），还是反对科学，崇拜抽象的人（人本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片面的。

三·马克思人类学思想与当代

大量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对进一步理解社会形态的变

更或交替，对进一步理解社会发展规律（非线性单一模式、非决定论模式），对进一步理解早期人类社会状况（前经济时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仅此是不够的，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对当代人类学理论研究和当代社会实践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人类学对当代人类学的直接影响，就是促成了解放人类学的创立。1939——1945年世界性经济和政治危机及二战以后东方国家或一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彻底粉碎了“拙劣”的传统人类学的神话，使当代人类学研究有了质的飞跃。解放人类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1973年在芝加哥举行了人类学与民族学国际协会第九次会议，这是当今人类学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标志着“解放人类学”的兴起。“人类学世界”丛书中有一本题为《人类学的政治》。总编辑在前言中写道：“人类学看来有必要从某些西方偏见中解放出来。迄今为止。人类学研究大多是在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一直缺乏客观性。过去被压迫的人民日益觉醒。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缺陷。”^⑩参加芝加哥会议的一个学派通过引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解放人类学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个学派的组织者斯坦利·戴蒙德创办了《辩证人类学杂志》，明确反对传统人类学倾向。他们出版了一本题为《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迈进》的论文集，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

在《辩证人类学杂志》中可以看到，解放人类学的关注点是：第一、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特别是对非西方世界的瓜分。第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被征服国家和民族的领土、资源、文物、情报的掠夺和攫取。第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所控制的国家、地区的政治支配。第四、帝国主义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国家所做的思想、文化干预和控制。可见，这里的解放人类学只是民族反殖反帝意义上的，因而也正是马克思在世时就已详细地加以研究和论述的。《辩证人类学杂志》1985年第9期专刊的副标题为“〔人类学〕学术状况，社会状况”，包含了诸多反映解放人类学新趋势的精辟论文。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二战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古巴、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越南等国的革命运动有力支持了这一理论。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地位没有改变一样，第三世界被西方控制、压迫的地位也没有改变，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甚嚣尘上，特别是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民族问题仍然十分严峻，“各民族相互联合”的时代并没有真正到来，和平与发展（南南问题、南北问题）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题，因而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对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这些问题又和人的问题息息相关，因此“许多西方国家的科学文献正经历着‘人类学繁荣’阶段”，^⑪但同时也证实和发展着（自觉不自觉地）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的人类学思想。在当代人类学进行的综合研究中，马克思提出的人的生命解放、宗教解放、从自然界的解放、妇女解放、阶级解放、种族和民族解放、以及贯穿其中的经济解放、法律解放、道德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均被详尽地做了研究和探讨。

而且，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对于克服科学主义倾向、实践主义倾向、经济主义倾向、人本主义倾向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科学主义片面夸大了科学进行之于人的解放意义，忽略了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对人的可怕的副作用：破坏生态环境，从军事方面给人类生存造成威胁。实践主义片面夸大实践之于人的解放意义，忽略了其副作用的一面：资源浪费严重，工业发达国家每人每年消耗大约30吨物质，仅有1—1.5%变为消费品，在最近500年伐尽了地球上2/3的森林。且导致了人的生物的非适应性急剧增强，从体力和心理上威胁着人自身的健康。经济主义夸大了经济对人类解放的决定意义，忽略了其对就业人口和第三世界不发达

国家的威胁，特别是忽略了人口因素对其的影响。人本主义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纯哲学范围内。而现在，“人类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它们越来越注意必须改变人本身、人的意识、道德和教育。认为这是所有其他变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社会方面发生变化的前提和条件。”^①特别是罗马俱乐部的领导佩奇的未来学理论在当今影响颇广。在轰动一时的《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佩奇引用了大量的“我们的朋友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提出了应从人类社会的角度去研究全球性问题，应注意人与科学、资源和其它因素。这种倾向和马克思建立“自然科学包括人的研究”和“人的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同一门科学”的取向是一致的。尽管由于论战的需要和为了避免使读者将其理论同抽象人道主义和“拙劣”人类学混同起来，他尽量回避了有关人的流行术语，但这一取向是鲜明的，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在方法论上，从科学、艺术、道德和价值的全面视角审查人和研究人。在实践意义上，调动全社会力量进行跨学科的统一研究。这一点连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例如，伦敦大学人类学家卡恩和社会学家劳贝拉指出：“如果不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理论著述来武装自己，一门统一的有关人和社会的科学就不可能存在；如果不是不断地借鉴社会科学中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继续成为一桩有创造性的事业”。因此，他们也主张，“要打破一切学科上的边界，建立一门关于人和社会的统一的历史科学”，即建立一门“新人类学”（注意马克思一百四十多年前所所言的关于人的综合研究是一门新科学的论断），也就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②

根据苏联著名哲学家弗罗洛夫的观点，马克思人类学思想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当代社会实践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国际社会的全球性问题。它们与诸如社会经济体制、国家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如和平问题和裁军问题、全球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克服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落后状态等问题）。第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全球性问题。它们与人同社会的关系有关（如科学技术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人口增长问题、保健问题、人的生物适应性问题以及人的未来问题）。第三、自然——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它们存在于人、社会同自然的相互作用之中（如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

现在，进行这一研究的条件已大大改善。交通工具的发达缩短了全球时空距离的间隔；摄影、录音、录相器材及计算机技术的普遍使用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工具装备；国际性跨学科组织的出现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基因工程学和生物工程学、人类遗传学和新医学、大脑潜力研究和“人工智能”、人类工程学和人的生理、心理学、以及新优生学等为这一研究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此外，贝塔朗菲的系统论、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的突变论、艾根的超循环论等新兴方法论学科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3页，第105—10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6页。

⑤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分册，第51页。

⑥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卷，第304—305页。

⑦⑧ 《人类学趋势》1988年第2期，第4页第3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129页。

⑩⑪ 《人的前景》[苏]弗罗洛夫构，第14页，第102页。

⑫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特辑，第407页。